

青年网络自嘲现象流行的原因、风险及应对

■ 杜成敏 张 瑜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北京100084)

【摘要】近年来,青年网络自嘲热词频出,形成了一种网络自嘲现象。其得以生成,既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倾向,也是数字化交往中群体心理驱动的结果,还与内卷化冲击下的集体利益诉求密不可分。网络自嘲在帮助青年自我调适、疏解压力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主体迷失与精神内耗的自我认知风险、交往异化与代际鸿沟的社会认可风险、政治疏离与价值错位的社会认同风险,必须保持警惕并积极应对。消解网络自嘲现象流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青年要找准人生定位,提升个人能力;媒体要传播主流文化,强化价值引领;政府等相关机构要推进社会改革,改善宏观环境。

【关键词】青年心理 网络自嘲 青年亚文化 社会心态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4.011

2023年初,“鼠鼠文学”和“孔乙己文学”在网络媒体上走红,迅速引发青年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实际上,近年来在网络舆论场上已经兴起了一种青年自嘲现象,从“985废物”“打工人”到“鼠鼠”“孔乙己”“祥子”,层出不穷的网络自嘲话语体现出青年的生存境遇和群体心理,反映了社会变迁下青年对于自身命运的思索和行动。本文尝试对网络自嘲现象进行综合解读,探讨这一现象的流行动因与潜在风险,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有所裨益。

一、青年网络自嘲现象的产生与表现

自嘲(self-mockery)是指透过轻视、贬损或嘲笑自己来惩罚自己或自谦的行为,有自我嘲笑、自我解嘲的意思。自嘲话语背后映射了社会现实与个体心态。马克思指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1]从动机来看,自嘲是处于社会窘境的人们为引发共鸣而放低自我姿态或表达失落情绪而采取的言语策略,具有自我贬低型和自我增强型两种类型。自我贬低型的自嘲指的是对自己使用夸张的负面评价,带有不符合事实

收稿日期:2023-05-13

作者简介:杜成敏,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社会思潮;

张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高校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基于微博大数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研究”(课题编号:21KDB009)、清华大学2022年网络文化工作研究课题重点项目“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特点。如孔子在面对他人嘲讽时的自嘲，“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2]这样的自嘲通过自我否定获得他人接纳，是缓和社交氛围的一种手段。而自我增强式的自嘲指的是以无害方式开自己玩笑，不造成即时性否定和伤害。启功晚年就曾自嘲道：“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3]这样的自嘲是疏解个人心绪，保持乐观的一种方法。

网络自嘲是互联网时代自嘲行为的新形式，在就业难题、住房压力、婚恋困境等现实问题面前，部分青年在网络空间中释放自我否定和自我解嘲的情绪，进而沉浸在一种对自我“调侃”“搞笑”“揶揄”的网络狂欢中。他们在社交平台上自诩是“屌丝”“社畜”“小镇做题家”“打工人”“985废物”，在面临竞争和压力时自嘲“佛系”“躺平”“摆烂”，表达羡慕时说自己是“柠檬精”“酸菜鱼”，谈论情感时称自己为“舔狗”，在尴尬处境下感叹“小丑竟是我自己”，如是“自怨自艾”的话语符号，勾勒出新亚文化——“网络自嘲”——的轮廓。就形成来看，网络自嘲话语有“拼贴挪用”和“同构再造”两种类型：“拼贴”是在既有概念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内涵，即旧词新意；“同构”是“某种结构、形象的复制与翻版”^[4]。通过拼贴和再造，网友将各式各样的人物、图像、词汇、动作等元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自嘲行为。网络自嘲颠覆了文本原有的“能指”与“所指”，在“解构”的基础上兼具“建构”的成分，并以网络上的“狂欢”和“批判”的精神面貌体现出对个体和社会的情绪，具有诙谐幽默和犀利辛辣的风格。与传统的自嘲相比，网络自嘲的戏谑化色彩更加鲜明，同时也充斥着颓废无力、疲乏沮丧的“丧文化”气质。但网络自嘲并不完全等同于“丧文化”，它是“丧文化”的众多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在表现出“垂头丧气”一面的同时，网络自嘲也意味着情绪调节和压力释放，“打工人”“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等网络自嘲话语的背后同样隐含着奋斗旨归和对美好生活的积极向往。

综合来看，网络自嘲是指青年群体在网络媒体平台上通过自我嘲讽和自我解嘲风格的文字、表情包、图片、影视等符号进行社交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方式有明显的颓废无力、戏谑嘲讽的文化特征，反映了青年群体在面临求

表1 近五年来流行的网络自嘲话语

年份	网络流行自嘲话语
2019年	柠檬精、社畜、酸菜鱼、我是什么垃圾
2020年	打工人、小丑竟是我自己、985废物、工具人
2021年	摸鱼、躺平
2022年	小镇做题家、冤种、摆烂
2023年	鼠鼠文学、孔乙己文学、骆驼祥子、范进中举

学、就业、婚恋等现实困境下的压抑心理和负面情绪，是一种表面沮丧而内心仍然保有积极向往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

二、青年网络自嘲现象流行的主要原因

任何语言现象都产生和发展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人表现为有所言谈的存在者。这并不意味着唯人具有发音的可能性，而是意味着这种存在者以揭示着世界和揭示着此在本身的方式存在着。”^[5]作为社会变迁的产物，青年网络自嘲现象发端于青年，传播于网络，是作用于社会的流行符号、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综合体现。

（一）社会化过程中的个体行为倾向：自我调适与自我保护

自嘲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的独特产物，而是古往今来众多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行为倾向。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6]。实际上，社

社会化是贯穿每个自然人一生的过程,适当的自嘲是人与社会的一种相处之道。社会化意味着学习社会中的标准、规范、价值和所期望的行为,这一过程通过意见、观点和情感的交换逐渐深化。但是,一方面,社会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减少这一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感,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个体事实上倾向于自我调适的行为。“采用一种‘亲密性的个体化策略’(intimate individualization),即个体的自由、独立甚至社会反叛意识这样一种本能,始终与各种亲密性的知识处于不断的磨合和调适的过程之中。”^[7]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通过自嘲的方式放低身段,或用谦逊的话语谴责、低估自己的行为,或用诙谐的语言活跃、营造良好气氛,从而获得心理宽慰和沟通顺畅。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差抹平后带来的心理落差,容易使大众陷入一种集体性的焦虑之中。作为缓解焦虑、重新寻找自我定位、修正自我评价标准的方法,降低自我认同和对他人评价的期许就成为了最简单有效的途径。正如有些网友自嘲是“柠檬精”“酸菜鱼”,虽然是表达对他人的羡慕和憧憬落后的心酸,但这种坦率反而能够起到心理调适与自我安慰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社会化交流中,相对于直接的意见表达,“自嘲”是一种极其安全的自我展示方式。善于自嘲可以让自己看起来“不特别”,谦虚谨慎和人畜无害可以让自己更安全。青年逐步进入到人生转型期,扮演越来越多社会角色的同时需要承担社会交往所带来的风险。他们面对的社会和网络环境中,需要应对的矛盾很多,在互联网上大量戾气和众多观望面前,自嘲是一种回撤性的自我保护机制。通过自嘲做出谦和的平民甚至弱者姿态,为他人的要求和期望提供了约束力。泰戈尔在《园丁集》中就形象地指出了这种动机:“我把我的痛苦说得可笑,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8]也有网友表达了同一层意思,“只要我先自嘲,别人的嘲笑就伤害不了我。”

(二)数字化交往中的群体心理驱动:身份共鸣与话语狂欢

数字媒介时代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被重新塑造,各类社交媒体平台进一步激活了人们在网络世界的连接,催生了许多以群体、社区为单位的网络流行文化,深刻影响了广大网民特别是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的社会心理。通过网络自嘲,在彼此的分享、认同、共情和鼓励中,青年在数字化交往中建立并加强与世界的联系,获得了“群体认同”的庇护、和他人同属一个阵营的踏实感,实现了身份共鸣和社交满足。一方面,根据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理论,只要有一点点的借口,就能形成一个松散的群体,产生淡薄的群体意识。网络自嘲发源于青年发展的群体性困境,通过独特的话语、表情包、标识等符号培养起独属于自嘲群体的话语风格,并进行青年群体的自我归类,调动了他们参与其中的情感共鸣和社群归属感,构建了虚拟社交下的群体认同。同时,网络自嘲独特的话语风格和内涵明显区别于其他亚文化,增强了自嘲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区隔,进一步提升了群体认同感。为了寻求网络群体的接纳和认同,青年会主动地理解和接受“自嘲梗”。群体认同感的打造,让青年群体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有利于减少距离感,增强身份共鸣。通过吐槽相同问题,输出相同情绪,青年们往往可以从这种情绪的传达与共鸣中获得慰藉与解脱。正如“打工人”“工具人”等自嘲话语,不只是隐射对内卷式工作的无奈,也有着青年对自我身份的乐观认同。另一方面,网络自嘲的表达方式、诙谐的风格、社交的形式,都赋予了其娱乐、互动的强大功能,其传播常常会产生一种“线上狂欢”的景观。前苏联文艺学家巴赫金曾提出“狂欢的广场”理论,当代互联网的草根性和匿名性的自由氛围契合了其全民参与平等自由对话的内核。在互联网广场上,青年们以虚构的自嘲符号和戏谑的自嘲文字共同呈现出一场具有后现代哲学特点的狂欢仪式。其中,互联网的交互性和开放性为狂欢创造了极为宽松的交流方式和表达环境,其无边界和即时性则为话语狂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便利的平台,而关于自嘲的网络造句、表情包等符号话语是狂欢的重要载体。互联网的这种特征激发了青年网络自嘲狂欢的激情,他们通过设置“打工人”“鼠鼠”“孔乙己”“祥子”等“主题”,广泛参与网络互动跟风社交,频繁使用并不断创新自嘲符号的内涵与形式,

在虚拟空间建构虚拟人格,规避秩序的约束,营造出一种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创新、人人可表达的氛围,从而得到狂欢与愉悦。

(三)内卷化冲击下的集体利益诉求:情绪宣泄与意见表达

“内卷”一词原本指社会文化模式发展过程中的停滞,现在被用来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内部消耗和停滞不前。“当代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内卷’问题,特别是在青年集聚的教育、就业、职场等领域中‘内卷’问题尤为突出。”^[9]在主动或被动卷入竞争的过程中,青年通过自嘲,将利益诉求、人生愿景和生活情趣相贯通,用自嘲段子、表情包在社交平台和网络论坛进行意见表达,成为当下自嘲现象流行的重要社会动因。一方面,在内卷化冲击下,青年通过自嘲进行身份的自我消解,来抵抗内心的冲突与焦虑,从而起到“解压阀”的作用。韩炳哲指出,当代社会的生命政治已经演变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功绩社会。在功绩社会的治理之下,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竞争的压力和被淘汰的焦虑,为了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获胜,功绩主体只能不断地学习和加班,所以,“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10]处于职业成长关键期的“90后”与刚刚步入职场的“00后”,面临着生活工作压力以及从学生时代迈向社会时所特有的角色撕裂感,在这种状态下,压垮青年的便是自己对自己的“过量的肯定”。对处于困境中的青年群体来说,自嘲常常被视为一种“宣泄”行为,通过自嘲“躺平”“摆烂”“摸鱼”,就可以为自己寻找“脱困”的借口,达成和解接纳自己,从而放下很多负担和压力,缓解精神痛苦。另一方面,自嘲提供了一个意见表达的机会和窗口。它允许青年用戏谑、被接受的语言来表达对于集体利益的诉求和现实生活的不满。在经济形势严峻、工作环境内卷、上升渠道不畅等困境下,部分青年处处碰壁,自信心受到打击,话语权时而被剥夺,社会资源和财富又常有配置不均衡的问题。面临这些经济和社会困境的青年群体,通过自嘲的形式表达不满情绪,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实质是社会参与的一种方式。他们在沉默和无力中找到了声音和力量,进而潜在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主张。同时,自嘲话语简短易传播,网络平台的碎片化传播过程把自嘲话语更加即时地展现,往往能戳中青年群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痛点”“痒点”,使他们的社会焦虑感和相对剥夺感得到释放,迅速引发群体的共鸣和模仿传播。

三、青年网络自嘲现象流行的潜在风险

网络自嘲一旦超过情绪疏解和正常社交的限度,就会丧失积极意义。其流行与过度使用如果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不仅会强化使用者负面的自我概念,造成主体的价值迷失和精神内耗,还容易使青年群体交往异化,引发代际鸿沟。同时,自嘲背后对现实的尖锐批判容易造成政治疏离和价值错位,降低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

(一)自我认知风险:主体迷失与精神内耗

某种意义上而言,自嘲是人通过语言对自己的精神与人格进行解构的一种行为,属于有损尊严的举动,长期处于这种自我否认状态中,会滋生自卑、怀疑、不安、颓废等负面情绪,严重削弱人的自信心、意志力、行动能力,对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长期的自嘲可能导致青年人的自信心受到打击,挫伤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对自我谴责的强调,能暂时地振奋精神,但却加速了人的尊严的最后崩溃。”^[11]网络自嘲表面上进行了自我调适和自我保护,但个体在脱离了可能的伤害外,不自觉又陷入了自己和他者共同建构起来的语言陷阱和虚假环境之中,放大了社会问题的同时也暴露了自我短板,使个体不能准确感知自身和社会。久而久之,个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自嘲中“消解了”,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主体迷失状态,使青

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消极应付和莫衷一是,迷失在没有目标没有动力的“怠慢”之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热衷于自嘲,则反映出自嘲者缺乏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将‘不好的结果’归结于种种外因,为自己寻求各种托辞,对生命的意义缺乏认真的追寻。”^[12]更进一步,当个体性的自嘲在网络上发酵成为独特的亚文化景观,甚至成为青年一种正常的行为模式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向自嘲的社会情境靠拢。自嘲语言的模仿和复读,不仅使个体性的迷茫发展为普遍性的焦虑,还有可能导致青年失去本该有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网络自嘲也容易造成青年精神内耗。他们对现实感到痛苦,但又无力改变,通过跟风式地自嘲虽然舒缓了情绪,但同时也转移了主题。冲突和矛盾却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日积月累中暴露更多问题。心理学家阿德勒曾指出:“因为自卑感常常引起紧张,所以就有种朝向优越感的强制性行动,但却不再指向解决问题。因此朝向优越感的行动指向了生活无用的部分,真正的问题被掩盖或者排除了。个体尽力限制行动的范围,更专心于避开失败,而不是追求成功,他会在困难面前犹豫、停滞,甚至后退。”^[13]青年通过自嘲等方法进行自我调适,容易带来无休止的自我怀疑、无止境的自我攻击、没完没了的纠结犹豫。他们“在‘卷不卷’‘躺不躺’‘佛不佛’‘丧不丧’的相互摩擦、拉扯和消磨中,加速着自身精神内耗的积淀生成”^[14]。在自嘲话语中寻求自我,除了即时的快感满足以及短暂的精神解脱外,留下的只能是幽深的无聊和无尽的空白。

(二)社会认可风险:交往异化与代际鸿沟

网络自嘲现象的流行不仅容易造成青年群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异化,还可能导致其他群体对青年群体印象的误解,扩大代际鸿沟。一方面,沉浸于网络自嘲带来的群体认同和身份共鸣可能导致个体过分依赖网络,甚至丧失正常的人际交往、意见表达、情绪调节的能力。自嘲的重复使个体无法科学认识自我、准确把握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造成个体对虚拟和现实之间的混淆,甚至形成双重人格。习惯使用自嘲话语的青年很容易呈现网络“社牛”、现实“社恐”的双面状态,他们线下交往意愿减弱、社交能力退化,在面对面的社会交往时会感到紧张、有压力、不自在,出现社交焦虑和社交恐惧。同时,“自嘲”“自黑”等方式通过自我贬低来娱乐别人,无疑把自己放在人际交往中较低的位置,地位的不平等很容易造成关系的异化。过度自嘲可能让人觉得缺乏信心或者过于消极,当他人对自己的自嘲表现出认同时,负面的冲击会更强烈。网络自嘲现象的流行,潜移默化地会对日常交流用语造成影响,让人习惯性地讲话时使用消极词汇,强化负面的自我概念,形成低迷消沉的态度情绪。而这种习惯会在交往过程中不自觉地传递给他人,长此以往会表现出不积极的一面进而妨碍正常的人际交往。另一方面,“自嘲”现象可能导致其他群体对青年群体的片面认识甚至污名化。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自嘲式狂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青年与权威、自由与秩序、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对立,天然地与主流文化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关系。当“趣味相投”的青年组成网络社群,把自嘲话语当作他们的交往“通行证”,同时也把社会其他群体隔离在外,从而增加了群体之间的隔阂。过度使用负面词汇戏谑和自嘲,会加剧主流社会对部分青年的误解,让其他群体产生“颓废的一代”“堕落的一代”般的不解和歧视。而这种不解和歧视又会进一步阻碍双方的日常交往,加深沟通障碍,减少交流频次,从而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健康交流。“当主流社会不了解这些流行语时,代际交往之间就会出现巨大的交往鸿沟,这种鸿沟不仅体现在语言上,而且体现在心理上、精神上。”^[15]

(三)政治认同风险:政治疏离与价值错位

网络自嘲流行话语中的负面情感与主流话语系统背道而驰,背后隐藏着青年对现实的尖锐批判,容易造成青年的政治疏离和价值错位,降低青年群体对社会的政治认同。所谓“政治疏离”(political alienation),是指公众对政治体系及其运作的不认同,从而引起行为入自外于政治参与的一种心理状态,并且付诸实际可见的不关心、不讨论、不作为等拒绝参与政治活动的

行为实践^[16]。正如前文所说,网络行为本身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一些“自嘲”其实是采取“反讽”手法,软中有硬的一种抗争,背后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价值观。青年人自嘲是“孔乙己”“范进”,称“学历是脱不下的长衫”“人人都笑范进,人人都是范进”,实际上反映了当前社会中存在的教育不公、就业压力大以及学历歧视等问题。网络自嘲以一种看似散漫的消解以及对于那些过分严肃的、板着脸准备说教的揶揄与抵抗,不自觉地把正面教育和宣传视为空洞的、不切实际的说教而消极对待。青年长期对这样的自嘲话语耳濡目染,潜意识地把困难归咎于社会和外界,建立起想象中对立疏远的“他者”形象,就逐渐失去了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也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产生了“政治疏离”现象。同时,在网络社群中信息传播的同质性和封闭性会导致部分青年的价值认知窄化,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将这一价值认知逐步固化,从而在少数青年中出现了信仰危机和价值观错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接触的信息是同质的,对世界的判断就容易出现偏差。勒庞为这类集聚的群体起名为“乌合之众”,他认为身处群体中的个人会不自觉感受到群体中势不可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拥有了发泄欲望的本能,进而个体也会影响到对集体的行动和情感。“泛娱乐化世俗化的网络文化满足了青年群体寻求的‘新认同’,填满了青年个体因脱离‘集体关系’而产生的心理孤独与无所适从,青年个体因此对网络娱乐文化表现出强烈的精神需求与心理诉求,对当前的信仰产生怀疑、动摇甚至想要抛弃的想法。”^[17]当前背景下,网络自嘲现象很可能成为抒发非理性情绪的集合地,一些网民会利用自嘲自贬的话语来讽刺收入差距、阶层分化、就业困难、教育内卷等这类现实问题,进而勾起人们的愤怒与憎恨,激起民众更多的同情心,让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到对社会的非理性宣泄和讨伐当中,引发对党和国家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

四、青年网络自嘲现象流行的应对策略

青年网络自嘲现象的流行映射了社会现实与大众心态,是社会氛围、舆论环境和个人行为等多方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新时代,培养青年自信自强的积极心态,化解网络自嘲现象流行带来的潜在风险,需要组织层面积极疏解内卷化压力、媒介层面主动消解网络社会的焦虑氛围、个人层面以精神涵养实现价值理性的回归。

(一)自我审思:找准人生定位,提升个人能力

网络自嘲等消解式的语言与生活态度背后,是每个青年都无法逃避的自我追问——如何面对生命的价值与挫折?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自我要有客观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察觉问题所在并及时解决问题,以免陷入个体封闭、群体对抗、历史虚无的“荒芜之地”。必须要认识到,网络自嘲虽然间歇性地缓解了青年对自身能力欠缺的紧张感,但并不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尽管自嘲是每个人的自由,但自由与责任是人生的两面。当我们面临种种困境时,自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热衷于自嘲而有意逃避责任,则难以超越自我,寻求生命的本真。”^[18]面对网络自嘲现象流行的侵蚀,青年要在审视时代趋势下探寻自我定位,以精神涵养实现价值理性的回归,以积极的实践探索生命的意义。首先,要树立正确价值观,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注重个人修养,超越物质追求,从关注物质化、功利化的事物本身回归到关注自我和价值观的提升上;停止自我贬低、自我设限和反复犹豫,通过自我对话、时间管理、情感支持和利于身心的兴趣爱好等方式养成积极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保持独立思考 and 理性判断,避免陷入群体盲从和社交狂热,在社会生活和网络交往中少一些随波逐流的模仿跟风,多一分沉着冷静的定力。其次,要辩证地看待个人成长中的挫折,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实际上,个体社会化中的很多困难和挑战是不能避免的,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克服难以确证

自身。一味沉溺于负面的情绪,既改变不了现状,也隔离了正面情绪的体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19]青年应客观认识自我,挖掘、发现和找到自己的优势和特长,补强或者规避自己的弱势和不足,在不断反思中升华自我,依托实际行动和努力奋斗提升生命效能感、控制感、希望感和意义感。最后,要持续强化学习,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坚持长期主义,培养成长型思维,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知识,锤炼过硬本领,提升思维视野、思想观念、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特别是在数字化高速发展背景下,要以数字化思维和能力为锚点,培养开放、创新、系统化、数据驱动的思维方式,促进素质型技能的全面发展。

(二)媒介参与:传播主流文化,强化价值引领

互联网背景下,网络媒介不仅是影响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观的关键因素,也是青年自嘲现象发生的主要场域,加强网络文化治理,要充分发挥不同媒介的信息传播和价值引领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首先,主流媒体要进一步引导社会舆论,强化价值引领。打造优质文化,强化内容供给,结合青年年龄特点和时代特征,多推出一些高质量、有价值、“短而精”的网络文化产品,满足当代青年的网络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尊重青年主体地位,以贴近青年生活的话语引导青年,用鲜活向上的案例感召青年,增强青年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自信心;致力于“发青年之声”,把目光聚焦在帮助青年解决困难、减少障碍、缓解压力上,调研收集青年群体的心声和建议,反映青年诉求,进行政策倡导和社会倡导,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指导和帮助,避免想当然的“爹味说教”,为广大青年营造更好的成长和发展环境。同时,主流媒体要推动专家学者、社会公众与青年之间的良性沟通,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青年群体,设法弥合不同群体的认知裂痕,凝聚社会共识,摒弃偏见与排斥,营造青年成长成才的良好舆论氛围。其次,社交平台的管理者、运营者和传播者必须摒弃“流量为王”的绩效导向,对网络信息进行严格把关,创造和传播优质信息产品。积极发挥信源作用,借助传播优势向青年宣传媒介知识、技能和观念,引导青年群体进行积极的媒介使用;充分利用技术优势,运用“算法+产品”破解“信息茧房”和“沉默漩涡”,及时过滤社交媒体上过于负面、消极、虚假的信息,把具备误导性和虚假的文章进行处理;此外,在算法推荐之外必须有正向价值导向,为主流媒体在热点事件的传播中发声创造条件,传播好主流声音。最后,要加强自媒体管理,引导其生产传播优质内容。相关部门要制定完善自媒体运营规范管理的制度法规,集中整治造谣传谣、以偏概全、逻辑混乱、炒蹭热点等乱象,下架为了“流量”而贩卖焦虑和愚化公众的平台作品,破解信息内容失真、运营行为失度等深层次问题。同时,互联网企业、网络内容社区、行业协会等要建立完善自媒体自律与责任追究机制,严肃处理那些为了盈利或娱乐猎奇而传播焦虑、煽动情绪甚至恶意造谣传谣的自媒体。引导自媒体崇德尚善、树立正确的舆论观和价值观,承担社会责任,用健康向上的内容激励青年、引导青年。

(三)组织协同:推进社会改革,改善宏观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处于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在学习、工作、生活方面往往会遇到各种困难和苦恼,需要社会及时伸出援手。”^[20]对于网络自嘲现象流行所反映的教育焦虑、就业困难等问题,政府、群团组织、学校等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协同,推动教育、就业、住房等事业改革,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为青年解决困难、减少障碍、缓解压力。首先,政府要推进全面改革,建设更加有秩序、机会均等的社会,营造公正多元的文化环境和竞争氛围。通过改善社会制度,平衡各阶层资源分配和利益诉求,增强社会公正性,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聚焦青年就业、住房、婚恋、社会融入和社

会参与、社会保障等领域,大力解决青年的“急难愁盼”事项,为其提供劳有所获、住有所居和心有所盼的生活环境,力争为青年办实事、解难题,助推青年与社会共同发展。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牵头学校、社会相关机构等协调建立心理治疗和疏导网络机构,帮助青年调节自身情绪,提高他们的心理韧性和应对压力的能力。其次,群团组织要深入到青年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困难需求,从青年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为青年发展搭平台、建舞台。“青年有什么需求,团组织就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努力使团组织成为联系和服务青年的坚强堡垒。”^[21]努力拓展群团工作社会化路径的同时,打造“网上群团”,走好网络群众路线,让服务对象找到组织、参与活动,解决实际问题。最后,教育部门、学校等相关机构要推进教育改革,为青年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着力改善同质化、功利化、内卷化的教育现状和与社会用人导向脱轨的教育内容,让青年拥有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用技能,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发掘个人兴趣和特长,鼓励创新和自由发展,让青年有更多选择,减少身份认同危机。高校和各级青年组织应该积极开展人生观世界观主题教育活动,引导青年群体乐观面对人生中的困难,理性合理解决难题。思政课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目标,保持认真务实、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正确认识得与失、顺与逆、乐与苦等人生矛盾。总之,政府、学校及相关部门只有用切实举措帮助青年解决发展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自嘲现象流行的风险,提升青年群体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 [2] 司马迁:《史记世家精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页。
- [3] 启 功:《启功六十六岁<自撰墓志铭>》,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 [4] 谭景文:《情感共鸣与万物皆娱:青年网络自嘲文化的生成逻辑》,载《视听》,2021年第5期。
- [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 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92-193页。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 [7] 刘 珩:《文化亲密性与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组织方式》,载《思想战线》,2017年第4期。
- [8] 泰戈尔:《园丁集》,冰 心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 [9] 熊 钰:《网络“躺平”现象与青年奋斗精神培育》,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
- [10] 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74页。
- [11] 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郭本禹 方 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 [12][18] 蒋建国:《网络自嘲:自我贬抑、防御机制与价值迷离》,载《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2期。
- [13]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吴 杰 郭本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 [14] 王乐乐 李 伟:《纠结与治愈:青年精神内耗的表征、根源与应对》,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3期。
- [15] 骆正林:《网络流行语背后的青年社会心态》,载《人民论坛》,2022年第10期。
- [16] 束晓舒:《煽情报道带来的政治疏离——以马航事件为例》,载《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3年。
- [17] 卜建华 徐凤娟:《网络社会青年信仰泛娱乐化庸俗化风险的“文化景观”与破解策略》,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期。
- [19] 《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 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学刻苦磨炼促进青年成长进步》,载《人民日报》,2017年5月4日。
- [20]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页。

(责任编辑:张 丹)